

华文教育研究丛书

总主编 郭 熙
副总主编 李嘉郁

华语习得研究

主编 盛继艳
副主编 刘燕君



上海
商务印书馆

华文教学研究丛书

总主编 郭 熙

副总主编 李嘉郁

华语习得研究

主编 盛继艳
副主编 刘燕君



商务印书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语习得研究/盛继艳主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华文教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100-11332-8

I. ①华… II. ①盛… III. ①汉语—对外汉语教学—
教学研究 IV. ①H1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27284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华语习得研究

主 编 盛继艳

副主编 刘燕君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冠 中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978-7-100-11332-8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6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9 1/4

定价:30.00 元

总 主 编	郭 熙		
副总主编	李嘉郁		
主 编	盛继艳		
副 主 编	刘燕君		
编 者	盛继艳	刘燕君	付 钢
	张 宠	陈雯雯	梁 婷
	张江丽		

作 者 (按音序排列)

安 然	毕艳霞	陈延河
何子铨	李红印	李嘉郁
李晓蓉	林明贤	刘燕君
刘正文	倪伟曼	亓海峰
单韵鸣	史中琦	孙玉卿
唐 玲	王爱平	王功平
王建勤	王魁京	王茂林
王文艺	王燕燕	闻 静
闻 亭	尉万传	吴星云
吴英成	肖 峰	张金桥
朱雯静	朱志平	庄晓龄

前 言

郭 熙

一直以来,汉语教学被简单地两分:一是国内的语文教学,二是对外国或外族人的第二语言教学。近年来,华文教学被逐步地单列出来,无论是教学还是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进展。华文教学以华侨华人子女为对象,以语言文化传承教育为目标,旨在比较全面地培养这些“祖语生”使用母语文的能力。在世界各地非母语环境下开展母语教学,有各自的特殊情况,因此,华文工作者在勤力教学的同时,也围绕华文教学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发表了一大批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内容丰富,涵盖面广,它们源于不同的华语区,也发表在不同的华语区,表现出不同的风格和特点。它们有的重在理论,有的重在实践,针对性、目的性很强。

另一方面,随着华文教学事业的发展和队伍的扩大,对华文教学研究成果的借鉴和吸收也成了华文教育工作者的迫切需求。但是这些文章发表在不同时期和地点,查找起来比较困难。我们觉得有必要把相关的文献搜集起来,进行编辑整理,于是就有了这套《华文教学研究》丛书。

这套丛书共10册,分别为:《华文教学理论研究》《世界华文教育现状研究》《华文教学方法研究》《华文听说教学研究》《华文

读写教学研究》《中华文化教学研究》《华文教师培养与培训研究》《华文教材编写研究》《华语习得研究》《华文测试与教学评估研究》。

这次编选的总体思路是将相关论文的主要观点、研究方法、材料和结论集中起来,并尽可能地形成一定的框架,篇幅上则对原作尽量压缩,以便多选录一些。为了使读者对各册所涉领域的研究有一个总体的认识,我们请各册的主编分别进行了综述,希望这些综述能够反映该领域的实际。

选文尽可能考虑了不同观点的吸纳,但种种原因,未必能都照顾到,盼读者和作者谅解。

文献来自各个华语区,术语、行文风格和语言习惯都有差异。考虑到反映各地的实际面貌,除了一些技术性更动,语言方面大体保持原貌,必要时也加了一些注释。

这是我们第一次对世界各地华文教学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加之经验不足,时间紧迫,材料搜集困难,丛书一定有许多问题和不足。我们期待着读者的批评指正,更期待着更多的人关心华文教学研究。

综 述

盛继艳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海外华裔学生的华语习得特点逐渐引起了学者的关注,针对华裔学生华语习得情况进行的研究成果日益丰硕起来。我们对近 20 年来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甄选出部分成果辑录成册,以求为华语习得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一 华语习得研究的现状

与对外汉语教学领域的汉语习得研究相似,华语习得研究也可大体分成两条主线:一是关于华裔学生华语习得本身的研究,具体内容涉及语言系统的偏误分析、中介语系统分析、华语认知分析等;二是关于华语习得的相关因素研究,具体包括语言与文化背景调查、影响华语习得的外部因素分析、华裔与非华裔学生的华语态度及动机对比、学习策略研究、华裔学生华语学习特点考察、文化适应性及语言与文化的认同分析等。

(一) 华语习得的相关因素研究

华语习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是典型的二语习得,它在不同的学习者身上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母语习得性质,也有学

者把此类语言习得定义为“继承语”习得。在这种兼具二语和母语习得特点的语言习得过程中,学习者所受到的影响因素更加复杂。

从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文献来看,华语习得的相关因素研究包括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个体差异因素研究,另一部分是华裔群体特点分析。

1. 影响华裔学习者个体差异因素的研究。

目前成果中,影响华裔学习者个体差异的研究大体上可分为三类:语言文化背景调查、环境因素及社会文化心理分析。卢伟(1995)、吴建玲(1996)是较早对华裔学生的语言文化背景进行调查的成果,问卷涉及基本情况、语言环境、语言使用情况、思维方式、文化背景、汉语状况和学习目的等多项内容。另外,王爱平(2001,2002)曾先后就华裔学生语言文化背景调查研究的必要性和意义、调查的内容以及研究方法等问题展开过讨论。^①

在华裔学生习得华语的过程中,诸如家庭、学校、华人社团、华语媒介等环境因素的影响十分重要,尤其是家庭。李嘉郁(2011)在对海外华语教学状况细致考察的基础上,对家长在华文教学中的角色与作用进行了总结和探讨。^②

① 卢伟《菲律宾华裔青少年华语教育个案调查与分析》,《世界汉语教学》1995年第2期;吴建玲《对一百名华裔学生语言文化情况的调查报告》,《语言教学与研究》1996年第4期;王爱平《东南亚华裔学生语言与文化背景调查刍议》,《华侨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王爱平《东南亚华裔学生语言与文化背景调查研究方法述论》,《华侨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② 李嘉郁《家长在华文教学中的角色与作用——对周末中文学校有关状况的思考》,《世界华文教育》2011年第4期。

华裔学生的社会文化心理分析是整个华语习得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热点,具体的研究内容包括文化适应性、态度与动机、对华语社团的认同。文峰(2007)曾就来华学习动机、中华文化知识、对住宿条件与教学环境的满意度、人际关系与社交等内容,对华裔留学生的文化适应性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华裔留学生的文化适应性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闻亭(2007)以华裔与非华裔对比分析的方式,对影响二者华语习得的态度与动机进行了调查研究,认为华裔对华语社团的总体态度虽优于非华裔,但差异并不大;华裔学生的学习动机明显倾向于工具型,而融合型动机与非华裔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关于学习动机,王爱平(2000)也曾做过调查分析,认为基于华人身份认同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而产生的学习动机是华裔学生学习汉语的最重要的动机之一。^①

就华语习得而言,所谓的“认同”问题既包括华裔学生自我身份的认同,也包括华裔学生对华语社团成员、语言、文化、政治、经济、思维方式等多方面的认同。陈志明(1999)是较早讨论华裔族群身份认同的成果。王爱平(2000,2004,2006)多次从华语能力与使用情况、中华文化与宗教民俗、华语态度与学习动机等角度,来探讨印尼华裔学生关于华语社团的认同心理。相关成果中调查论述较为全面的当是朱雯静、王建勤

^① 文峰《多样性文化适应:对华裔学生来华留学的调查与分析》,《东南亚研究》2007年第6期;闻亭《华裔与非华裔汉语学习者对待目的语群体态度及习得动机比较研究》,《第五届全国语言文字应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7年;王爱平《东南亚华裔学生的文化认同与汉语学习动机》,《华侨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

(2012)一文。文章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考察了美国和东南亚地区华裔及非华裔华语学习者对目的语社团语言认同、文化认同、族群认同与价值观认同的现状,结果发现,华裔和非华裔汉语学习者在对目的语社团的认同上显现出不同的特点。^①

2. 华裔学习者华语习得群体特点分析。

一般来说,海外华裔通常会或早或晚或多或少地从家庭、华人社团、华文学校等环境,以及通过华语歌曲、华语影视等传播媒介习得一定程度的华语,即便是那些华语基础近乎于“零”的华裔学生,较非华裔还是会多一些华语及中华文化的感知经验,这些或隐或显的基础,将华裔与非华裔区别开来。

何子铨(1995)、金宁(1998)较早且较宏观地考察了华裔学生的华语习得特点。前者考察的是整个华裔群体,从华语接受能力、性格和学习方法对学习效果的影响、文化的吸收、学习的目的性等方面来讨论华裔学生华语习得特点;而后者考察的是东南亚的华裔儿童,重点描述考察对象对待华语学习的个人态度与语言环境。客观地讲,华裔群体在华语习得过程中所呈现的某些特征,有的表现为优势,有的则表现为劣势。对此,朱志平(2009)在掌握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对美国华裔学生在华语课

① 陈志明《华裔族群:语言、国籍与认同》,《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王爱平《东南亚华裔学生的文化认同与汉语学习动机》,《华侨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王爱平《印尼华裔青少年语言与认同的个案分析——华侨大学华文学院印尼华裔学生的调查研究》,《华侨华人研究》2004年第4期;王爱平《汉语言使用与华人身份认同——对400余名印尼华裔学生的调查研究》,《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朱雯静、王建勤《跨文化族群的认同比较研究与汉语传播策略》,《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12年第3期。

堂上所表现出来的优势及问题进行了全面总结与概括。深入讨论美国华裔习得特点的还有吴星云(2010),她运用语言标记理论,从中文声调、句法、语言能力、学习目标等角度对华裔与非华裔进行了对比分析。除上述视角外,单韵鸣、安然(2010)还专门就华裔学生的汉字书写过程与非华裔进行了对比分析。^①

(二) 华语偏误研究

华语偏误研究是华语习得研究中成果最为丰硕的一个领域,尤其是语音方面。

1. 语音偏误。

目前华语语音偏误研究大多是针对印尼华裔进行的,研究方法也基本相同,皆属于语料分析法,不同的是在分析语料的具体操作上,一类采用了听辨分析法,一类是实验法。

从“声、韵、调”三方面对被试的华语习得偏误进行全面考察的是倪伟曼、林明贤(2000),通过对被试语料所进行的听辨分析,归纳出印尼华裔学生在华语语音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得出印尼华裔学生上声偏误率最高的结论。声母方面,林奕高、王功平(2005),王功平(2011)采用实验分析法,先后对印尼留学生习得塞音和塞擦音、舌尖前音和舌尖后音等偏误情况进行了考察。韵母方面,王茂林、孙玉卿(2007)也采用语音实验的方法,分析

^① 何子铨《华裔学生学习汉语特点浅析》,《海外华文教育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金宁《东南亚地区华裔儿童学习汉语的特点及其教学对策》,《华侨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朱志平《美国华裔学生在汉语课堂中的优势和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吴星云《美国大学华裔与非华裔学生中文习得差异及教学法探索》,《华文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3期;单韵鸣、安然《华裔学生汉字书写特征的个案研究——基于与非汉字圈学生的比较》,《华文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2期。

了印尼华裔学生三合元音的偏误问题。声调方面,王功平(2004)通过语音实验的方法对印尼华裔学生的上声偏误做了进一步研究;王茂林(2006)通过语音实验对比,验证了印尼华裔学生四声习得由易到难的顺序是“阴平、去声、阳平、上声”,并指出绝大多数印尼华裔学生的强势语言已不再是汉语方言而是当地的印尼语,由于他们大多会讲英语,其语调偏误与母语为英语的汉语学习者是一样的。^①

除了印尼,现有成果中还有一些关于泰国、菲律宾的研究,如:李红印(1995)关于泰国学生语音偏误的考察;王燕燕(1997)对菲律宾华裔学生语音习得情况的调查分析。王燕燕在调查分析基础上,证实了赵元任先生关于“调域而不是调型造成了外国学生学习汉语声调的困难”的观点。^②

2. 词汇偏误。

专门讨论华裔学生汉语词汇习得的成果并不多。张翠翠(2009)关于东南亚华裔学生常用单音动词使用情况的考察是主要成果之一。该文认为东南亚华裔学生使用单音动词时正确率较高,偏误大部分与义项义相关,偏误的义项都是单音词的常用义项。干红梅(2009)在分析语义透明度对中级学生词汇习得的

① 倪伟曼、林明贤《关于印尼华裔学生汉语语音的调查及相应的教学对策》,《华侨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林奕高、王功平《印尼留学生习得汉语塞音和擦塞音实验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4期;王功平《印尼留学生普通话舌尖前/后辅音发音偏误实验》,《华文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2期;王茂林、孙玉卿《印尼华裔留学生汉语三合元音韵母偏误分析》,《世界汉语教学》2007年第1期;王功平《印尼华裔留学生汉语普通话双音节上上连读调偏误实验研究》,《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王茂林《印尼华裔留学生汉语声调习得分析》,《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② 李红印《泰国学生汉语学习的语音偏误》,《世界汉语教学》1995年第2期;王燕燕《菲律宾华裔学生汉语语音的调查与分析》,《世界汉语教学》1997年第3期。

影响时,选择日韩、欧美、华裔三组被试进行实验对比分析,得出的结论认为华裔学生汉语词汇习得受语义透明度影响大于日韩学生小于欧美学生。^①

3. 语法偏误。

语序不当、句法成分的遗漏与多余是语法偏误的常见形式。王文艺(2010)对菲律宾华校 35 名学生的 140 篇作文中所出现的语法偏误进行了穷尽式调查,认为“语序不当”和“多余与遗漏”是被试语法偏误的两大类型。陈延河(2002)专门就语序问题对印尼华裔学生的偏误情况进行了深入探讨。也有具体讨论某一语法项目的研究。闻静(2012)考察分析了初级阶段印尼华裔学生的“把”字句偏误情况。杨海明(2005)探讨了东南亚华裔留学生使用“了”时的主要偏误类型。^②

4. 汉字偏误。

通过对汉字习得偏误的考察与量化分析来归纳华裔学生汉字习得特点是现有成果的主要研究方式。吴英成(1990)以一篇 130 字的短文作为实验导引刺激物,通过听写的方式对新加坡华中的 30 名高一学生进行了汉字习得实验。结果显示:从汉字结构看,偏误率最高的是形声字(79.6%),其次是独体字

① 张翠翠《东南亚华裔学生常用单音动词使用情况考察——常用单音动词的分析为例》,北京语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年;干红梅《语义透明度对中级汉语阅读中词汇学习的影响》,《语言文字应用》2008 年第 1 期。

② 王文艺《从语法偏误看华语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以菲律宾华校学生作文为例》,《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6 期;陈延河《印尼语、汉语语序对比及印尼学生汉语学习中常见语序偏误分析》,《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2 年第 1 期;闻静《初级阶段印尼学生“把”字句习得偏误分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12 年第 3 期;杨海明《对外汉语语法教学的定位与“管用、精当、易学”——以东南亚华裔留学生“了”教学为例》,《第四届全国语言文字应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17.1%),再次是会意字(3.3%);从偏误性质看,别字高达88%。另外,吴文还对偏误发生的表面策略进行了归纳,认为偏误是由被试在旧有经验的基础上对汉字进行有原则却过度泛化所致,属于“语内偏误”。尉万传(2007)从共时和历时两个角度,采用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东南亚华裔留学生(包括9个国家518人)的汉字偏误进行系统考察,将其偏误划分为错字、别字、不规范字三大类及诸多小类,经量化分析,认为东南亚华裔留学生汉字偏误较欧美、日韩留学生偏误类型更加复杂多样,分布呈现较大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李嘉郁(2006)对华裔学生的301个错别字进行统计分析,认为华裔学生的汉字认知规律不同于其他外国学生,而类似于中国国内的小学生。^①

5. 语用偏误。

专门讨论华裔学生华语语用偏误的成果不多,这里重点介绍两篇。一篇是对被试言语行为整体情况进行考察的《华语教学的语用学思考》(刘正文,1998),一篇是单从拒绝言语行为的角度考察东南亚华裔学生汉语习得情况的《汉语拒绝言语行为及东南亚华裔留学生习得情况分析》(唐玲,2004)。前者主要对东南亚华裔学生在初级阶段口语学习中所出现的语用问题进行观察和分析,将偏误类型归纳为误用礼貌性原则、误用语用前提、违反表达的简洁性原则三类,并从语用学角度提出了解决对策。后者采用了问卷的形式,从愿望维度和语言表现维度对中

^① 吴英成《学生汉字偏误与其学习策略的关系》,《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1991年;尉万传、毕艳霞《东南亚华裔留学生汉字偏误考察报告》,《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07年第6期;李嘉郁《谈华裔学生汉字习得特点》,《海外华文教育》2006年第1期。

国人与华裔学生的拒绝言语行为进行对比,结果显示留学生的委婉拒绝率略低于中国人(相差6%),而直接拒绝比例远远高于中国人(近20%)。另外,该文还指出东南亚华裔学生实施拒绝言语行为时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语言表达过于简单、过于复杂、不会表达;二是语用失误。^①

(三) 华语中介语研究

华语是以普通话为核心的全球华人的共同语。华语既体现为现代汉语的标准语,也包含了现代汉语标准语的域外变体。也就是说,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海外华裔所习得的华语系统在某些方面会不同于现代汉语的标准语,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学习者的一种近似标准语的中介语系统。

目前相关研究不多,而且除了董琳莉(1997)是从语音的角度对印尼华裔学生的中介语系统进行全面描述外,其他成果皆为中介语语用系统分析。亓海峰与李晓蓉(2011)、肖峰与史中琦(2014)分别就应答称赞的语用策略、商业性场景中协商策略两个角度考察了美国华裔学生的华语语用能力。^②

庄晓龄(2010)非常值得关注。所谓“语码混合”,是一种洋泾浜(Learner Pidgin),是“已经达到一定的语言水平但是还没有完全掌握目的语基本语言规则的学习者在实际交流中由于注

① 刘正文《华语教学的语用学思考》,《暨南学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唐玲《汉语拒绝言语行为及东南亚华裔留学生习得情况分析》,《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② 董琳莉《印尼华裔学生学习普通话语音的难点及其克服办法》,《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亓海峰、李晓蓉《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语用习得的调查与分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11年第1期;肖峰、史中琦《目的语环境中语用能力的发展:美国华裔与非华裔学生在服务性场景中汉语协商策略的比较》,《世界华文教育》2014年第2期。

重交际内容而非目的语形式而产生的言语”^①。这种言语行为,既可能是学习者的动态中介语系统在特定时间的定型产物,也可能是学习者华语中介语系统僵化(fossilization)的、变异的现象。语码混合行为多出现在双语或多语者身上,从华语教学的角度该如何看待、如何施教,是非常值得探讨的。^②

(四) 华语认知研究

随着认知心理学的兴起,许多学者开始从认知的视角来研究二语习得过程。他们把二语习得过程看作一个认知过程,并主要运用信息加工理论框架来描述和阐释第二语言学习者语言加工的心理过程。目前,汉语认知研究已成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特色领域,成果也是极为丰硕,而相比之下,华语认知研究却十分薄弱。

王功平(2008)认为“语音感知既是言语交际的基础,也是二语习得的首要环节”。为此,王文以印尼留学生为被试,在通过感知实验得出他们感知汉语单音节声母的偏误规律的基础上,分析了产生这些偏误的主要原因,并提出了针对印尼留学生的声母听辨教学对策。王魁京(2006)从言语输出的角度,通过对被试做汉语书面表达时所出现的只会拼音的字、同音别字、非同音别字等现象的分析,对海外华裔与非华裔留学生的汉语心理词典的差异及形成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张金桥(2006)采用句子—图形验证任务技术,探讨不同汉语水平的印尼留学生理解汉语主动句、被动句所形成的命题表征中的项目顺序特点。汉

① 王建勤主编《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年。

② 庄晓龄《马来西亚华裔大学生语码混合行为及态度》,《中国社会语言学》2010年第1期。

字正字法意识的形成与发展是汉字认知研究的一个主要方面,也是体现汉字习得研究特色的领域之一。张金桥(2008)采用词汇判断任务探讨印尼华裔留学生汉字正字法意识的形成与发展,并指出印尼华裔留学生正字法意识的形成要早些,其原因可能与印尼华裔留学生非正式的汉语学习经历有关。^①

二 当前研究存在的问题

从前文所进行的梳理情况来看,关于华裔学生的汉语习得研究可谓喜忧参半。喜的是,近些年论著数量大幅增多,表明华裔学生汉语习得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忧的是,研究领域分布、研究维度以及研究方法的科学性等方面,均尚存不足。

第一,目前成果数量信息层面显示,该领域研究存在严重的不平衡性。就研究内容而言,成果相对丰硕的语音习得研究有十几篇,而其他各方面的研究不过三四篇,如此大的差距可能与作为语言物质外壳的语音更易于被感知且能够做穷尽研究有关;从研究对象的国别和区域来源看,绝大部分研究是针对东南亚华裔群体的,尤其是印尼。相比之下,对于欧美、日本等其他区域华裔学生各方面的研究都十分薄弱,亟待全面展开研究。

第二,现有成果虽然涉及华语习得研究的各领域,但较零散,不系统,基于现有研究很难全面了解华语习得的总体情况。就华语习得本身的研究来讲,现有成果多是偏误分析,而且大多

^① 王功平《印尼留学生汉语声母感知实验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5期;王魁京《海外华人学生汉语心理词典的特点与成因》,《语言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4期;张金桥《印尼留学生汉语主动句被动句命题表征项目顺序》,《心理学探新》2006年第2期;张金桥《印尼华裔留学生汉字正字法意识形成与发展》,《语言文字应用》2008年第2期。